

寫作，出版了有關一般社會題材的書籍。裨治文的《合衆國誌》和「益智會」的出版書籍就是例子。那時受過傳統文化教育的中國知識分子，都成爲閱讀這些書籍的對象，題材從天文地理至現代農業都有涉及。初期最多作品的傳教士，就是郭士立。這位傳教先進用中、英、德三種文字寫作及出版，JESSIE LUTZ 和 FRED W. DRAKE 敘述了他的作品。EVELYN RAW-SKI 以既問且答的方式，探討了以下問題：基督教傳教士透過他們所辦的學校傳遞了什麼價值觀？DANIEL BAYS 也寫了書中的兩章，一章是關於早期基督教作品，另一章則是把中國宗教流派和基督教作一比較。報導了華人如何從民間宗教皈依基督教

，并認爲基督教文藝是這些皈依的媒介。

其他數章敘述較後期來華傳教士的作品，包括：米憐、麥都思、盧公明、明恩溥。明恩溥和他的家人曾留居在一個中國村落多年，他所寫的《中國的特色》一書，敘述了當時的中國生活與文化，備受推崇；雖然該書以美國中產階級的價值觀作爲論點，但仍然是一本具備真知卓見的大衆化社會學。

爲該書執筆的學者們，對來華傳教士在傳福音工作上的得失，不予評斷。他們只以公正、平衡、純學術性研究態度，評估傳教士中文出版的質素和對近代中國的影響。事實，傳教士的通俗作品影響了中國的領導份子，推動他們尋求國際間的權利與平等，而這種尋求至今仍然持續。（穆藹仁）



## 《召喚》

John Hersey 著，紐約 Alfred Knopf 出版，1985年，701頁。

一般傳教刊物評介的，是學術作品，而不是小說。但 HERSEY 所寫的這本小說《召喚》(THE CALL)，却該是所有未來傳教士的必讀物。它和一般描寫傳教士及其工作的小說不同。它不是諷刺性作品，也不是誇張煽情的讀物，却是很精緻的學術研究寫作。《召喚》報導翔實可靠，是共黨統治前的中國二十世紀歷史全貌。它特別透過 DAVID TREADUP 和同僚的生活，正確地敘述了中國傳教理論與實踐的轉變。當

時，他們正處於一個被戰爭、革命、民族主義和社會急遽轉變所震盪的國家內，他們要爲基督教爭取一席之地。他們從不視自己是文化帝國主義的代理人，因爲那只是日後加在他們身上的稱號。

TREADUP 是十九世紀末主流基督教福音派的產物，他在美國西荔橋大學校園內所舉行的一次奮興會中皈依。當他參加一次「偉大的詹姆士·陶德」(即 JOHN R. MOTT) 在 NORTHFIELD 所主持的演

講時，他體驗到自己蒙受了傳教的召喚，要加入國際基督教青年會，結果在1905年被派到中國。他與抗拒和敵視的中國搏鬥，達四十五年之久。他發揮自己像巨人般的活力，且探索方法，如何能把基督宗教的福音切合中國的明顯需要。最後，他被歷史洪流和自己的幻想所打敗；他因為發現到一小撮外籍傳教士在這備受內戰震盪的國家內，并不能夠成就多少，而感到灰心喪志。終於，他改與一些華資工業家合作，提供人道主義的服務，以渡過餘下來的歲月。

HERSEY 或許會給這本書名為「覓」，（這原是TREADUP用於回顧自己生命日誌的名稱，是1943年他在被拘留期間內寫下的。）因它記錄了這位新英格蘭循道會基督徒一生不斷尋覓自己的真召喚，同時亦報導了他懷着福音的熱誠去關懷週遭受苦的人。

正當美國傳教士凱旋主義興盛的時期，他被召去中國。他相信憑着美國人懂得怎樣做，又會組織，亦有委身精神，必可「在這一代把福音傳遍世界」。乘搭去中國的郵船途中，他遇上一位老練傳教士，這位傳教士告訴他，上帝首先派遣英國人，「然後祂使另一批盎格魯撒克遜民族——我們美國人——能夠接近中國外教人的思想與心靈。……祂使我們成爲這些人民的最早傳福音者和教育家。在我們尚未知使命前，上帝已有了這一項計劃。」

TREADUP 幸好沒有完全接受了他的傳教觀點。他和華人同工合作，而且高興見到他們能負起領導中國基督教青年會的責任。不過，他向廣大群眾的演講，以及運用電影機與其他機器的宣傳，却實際是爲吸引中國人趨向西方科學、文化與宗教。

雖然他生活在中國共產黨崛起的時代，但他對促成毛澤東取得政權的不公義制度和革命勢力却從未加以研究。雖然他敬佩中國基督徒領袖、蔣介石元帥及其夫人，但在他的信件與期刊中，却很少談及當地的共產主義。共黨幹部接收他的農村計劃，使他受挫；他對此全不理解，亦沒有提及1937年中國基督教青年會秘書江文漢的預言：「我們開始看出，那些作爲基本解決中國問題的個別農村試驗只是幻想。很顯明地，我們似乎忽略政治與經濟問題的相關性。今後，關注個別的解決方法，應轉變爲與群眾認同；小調整應該被徹底改革取代。」（註）

TREADUP 爲何去到中國？他的召喚有什麼基礎？HERSEY 列出四個當代很普遍的理由：爲與人分享上帝愛的喜訊；爲在基督第二次再來之前，向一切受造物傳播福音；爲給予受苦者物質援助；爲體驗在中國生活的新奇。許多年後，當TREADUP想到自己許多的計劃都似乎失敗時，他才開始對自己昔日的皈依加以分析。原來，他因爲覺得靈魂空洞，才產生一種需要；在奮興會中他失去了自我控制；奮興會主持者採用了催眠方法；自己對死亡亦有過恐懼。

不過，TREADUP 並沒有把自己的問題看得太嚴重。他與很多同伴分享自己對召喚的矛盾心理，他們却被中國龐大的問題淹沒了。連最虔誠委身的傳教士也不能把自己的動機完全淨化。這位多才多藝者所幹的許多工作，着實影響了許多人的生活，他的計劃也給日後的農村發展奠下基礎。經過三十多年的浮沉，他所獻身服務的教會終於浮現出來，且日益堅強。（穆藹仁）

（註）JAMES C. THOMSON 著，  
WHILE CHINA FACED

WEST:AMERICAN REFORMERS IN NATIONALIST CHINA 。

(編者按：上述兩篇書介由紐約瑪利諾傳教會中國研究部提供，特此致謝。)



## 《中國基督徒：精英份子、媒介與香港教會》

施其樂著，香港牛津大港出版社，1985年，252頁。

這本書共有十章，內容會刊於香港的不同雜誌上，包括會刊於沙田道風山叢林所出版的「景風」雜誌的一些文章。這本書是為紀念皇家亞洲學會香港分會成立廿五週年而出版的，作者就是該社的副主席。

從未有一本以學術形式論及香港歷史的書出現過，本書就是首次，且是研究私人文件多年所得的成果。作者在二十多年前抵達香港，在崇基學院神學部執教，現已退休，但仍是一位業餘的地方歷史及族譜專家。他把1845至1910年間，基督教華人團體中幾位著名人物的生平介紹出來。

從本書我們能看基督教傳教工作如何在香港開埠時展開，確是很有趣的事。該書報導了一些懷有崇高理想和豐富學識的基督教傳教士（比如：理雅各及馬禮遜），如何協助創辦了真光女子學校及其他倫敦差會教堂。在1846年，何福堂被擢升為該會的牧師，他的事業和子孫至今仍稱著香港。此外

，何氏三兄弟，均曾在馬禮遜所辦學校受教育，是推動中國工商業步上現代化的先驅。還有很多青年亦由傳教士訓練成為香港政界、金融界、及專業人士團體的領袖。早期的香港基督教會，要面對中國家庭傳統組織。該書把這一切過程記錄在內，十分有趣。

這本集中在十九世紀末期的歷史書，行文流暢，載有很多接受傳教士訊息的華語社會的資料。傳教士努力提高本地英語水準，推動西方貿易與科技，指導西方基督徒方向，都是很有價值的記載。

雖然書中敘述了這些基督教傳教士傳揚福音的熱誠和努力，但是我們可以問：他們所建立的教會是一個什麼樣的信仰團體？這本書似未說明。

基督教傳教士要閱讀此書；關注中國教會團體的成長和喜歡了解十九世紀末期香港家庭生活歷史的人士，亦必會喜歡閱讀此書

(魏志立)